

# 評析「一九八五年蘇聯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總結」

——兼論蘇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

王承宗

## 壹、前言

蘇聯中央統計管理局於今（一九八六）年元月廿六日公布「一九八五年蘇聯國家經濟暨社會發展計劃執行總結」報告，將過去一年經濟計劃執行成果作了報導。由於去年也是第十一個五年（一九八一—八五年）計劃最後一個年度，所以將過去五年的經濟實績作總的評價是需要的。從計劃指標與實際成果相對照，已顯示蘇聯過去五年的經濟發展仍舊廣續一九七〇年代低迷成長的現象，而且呈現計劃指標和實績脫節的不良情況。

蘇聯經濟成長衰退的主要原因，係其經濟結構面臨轉型期，即從數量的增產轉向品質的改善，由粗放生產轉向集約生產。早期單純的以投入勞力物力來增加產量的方式，已不符合時代之要求；因此，如何發掘生產潛力、有效率地運用與節約勞力物力、快速採用引進新技術和生產設備，乃成爲近數年蘇聯經濟改革的主要課題。然而，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不但受到生產資料國家、集體所有制這種先決性條件的約束，而且也遭到人爲的、官僚體系的掣肘，以及其他客觀條件的束縛。改革是事倍功半之舉，阻力重重。

政治上，經過前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長達十八年（一九六四年十月—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統治，成爲老人領導和人事僵化。而且經濟領域的領導階層亦隨之老化與不求變革，貪污納賄、安於現狀；經濟管理鬆懈、勞動紀律廢弛，社會秩序惡劣。接著是安德洛波夫十五個月的短命統治，雖然作了部份人事更張和改革，却未能克竟全功；而契爾年柯於一九八四年二月接任，亦緊跟著在一九八五年三月病亡，更是毫無表現。新任總書記戈巴契夫總算是年輕有爲，以五四歲膺任新職。去年一年共有一名蘇

聯部長會議主席、七名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副總理）、十三名部會首長因健康緣故或非健康緣故退休，至於調換職務者則未計入<sup>①</sup>。預料將來仍會繼續強迫失職、不稱職的領導人員退休、去職，加速人事更替和年輕化，同時會加強勞動紀律。因此可預見的，經濟領域各級領導管理人員的更替，將會愈趨頻繁。

## 貳、一九八五年經濟實績

去年蘇聯用於消費與積累的國民收入 (national income) 比前 (一九八四) 年增加三·一%，達五、六七〇億盧布 (按實際價格)。工業總產值增長三·九%，共達八、〇八〇億盧布；農業總產值二、〇八〇億盧布 (按一九八三年價格)，無增長。重要工業產品生產情形如表一、二。

表一：主要工業產品生產 (一九八五年)

項目	數	量	以一九八四年為一〇〇
電力 (億度)	一五、四五〇	一〇四	一〇四
石油 (百萬噸)	五九五	九七	九七
瓦斯 (億立方公尺)	六、四三〇	一〇九	一〇九
煤炭 (百萬噸)	七二六	一〇二	一〇二
鋼鐵 (百萬噸)	一五五	一〇〇·二	一〇〇·二
礦質肥料 (折合百分之百純度, 萬噸)	三、三二〇	一〇八	一〇八
合成樹脂與塑料 (萬噸)	五〇〇	一〇四	一〇四
水泥 (百萬噸)	一一一	一〇〇·七	一〇〇·七
紡織品 (億平方公尺)	一一一	一〇二	一〇二
洗衣機 (萬臺)	五一〇	一一二	一一二
小汽車 (萬輛)	一三〇	一〇〇·四	一〇〇·四
電視機 (萬台)	九四〇	一〇四	一〇四
其中彩色電視機	四〇〇	一一二	一一二

註① ▲真理報，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四日，十一月廿八日，十二月三日，十二月廿二日。

表二：重要農業產品生產（一九八五年）

項 目	一九八四年產量	一九八五年產量
工業用甜菜（百萬噸）	八五·三	八二
原棉（百萬噸）	八·六	八·七五
向日葵（百萬噸）	四·五	五·二三
馬鈴薯（百萬噸）	八五·三	七三
蔬菜（百萬噸）	三〇·七	二八
肉類（百萬噸、屠體重）	一七·〇	一七·一
乳類（百萬噸）	九七·九	九八·二
蛋（億個）	七六五	七七〇
羊毛（千噸）	四六五	四四二

在科學技術進步方面，去年有十四項重要科學發現，二萬三千多件發明和四百萬件合理化建議。從事科學工作的人員大約有一百五十萬名。現有企業進行技術改裝和重建的規模增加，這方面的投資佔基本生產建設的投資三七%。在工業界推出三千六百種新型式的機器、設備、儀器和自動化資料。約八千個生產段、車間改爲成套機械化與自動化生產，建立了一萬一千多條機械化流水線、自動化與機器人生產線，現有一萬三千多個工業用機器人。

在基本建設方面，興建大約二百個國營工業企業。各種來源的國民經濟投資總額約一、七九〇億盧布。在農工業綜合體系內的投資總額達五五〇億盧布，其中四五六億盧布用於發展農業（包括九〇億盧布用於土壤改良的建設）。

一九八五年鐵路貨運量達三十九億五千八百萬噸，汽車運輸量六十三億一千九百萬噸，河川運輸量六億三千二百萬噸，石油管運輸量六億三千一百萬噸。各類運輸貨運量增加一·六%，客運量增加二·六%。

去年一年，蘇聯職工年平均人數爲一億一千七百五十萬人，集體農莊莊員一千二百八十萬人。職工平均每月現金工資一九〇盧布，而一九八四年爲一八五盧布；集體農莊莊員平均每月公共勞動收入爲一五三盧布，而一九八四年祇有一四八盧布。蘇聯人民從社會消費基金獲得的給付和津貼共一、四六五億盧布，比一九八四年增加五十八億盧布；因此職工平均每月的工資和津貼合計達二六八盧布，而一九八四年則爲二六一盧布。自一九八五年九月一日起提高各類學校教師的新給和職務加給；額外增加林業人員的補助費，提高建築業、衛生保健業等工作人員的津貼。國營與合作社商店的零售總額爲三、二四一億盧布，比一九八四年增加一三〇億盧布。在個別來源之資金的投入下，一九八五年共建成二百萬戶公寓住宅，面積一億一千三百萬平方公尺，其中農

村地區佔三千四百七十萬平方公尺。在各級學校受教育、受訓人數有一億零八百萬人，其中一般義務教育有四千四百六十萬人，職業技術學校有四百一十萬人，中等專科學校有四百五十萬人，高等教育有五百一十萬人。蘇聯去年共出版廿五億冊圖書和小冊子；有十三萬四千所公共圖書館為讀者提供服務，藏書總共超過二十億冊。各科醫師人數增加三萬四千人，全國醫師總人數達一百二十萬人。

據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統計，蘇聯總人口數有二億七千八百七十萬人<sup>②</sup>。

### 叁、對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評價

當一九八一年三月蘇共廿六大通過第十一個五年計劃草案時，曾說明五年計劃的主要任務是：「在穩定地逐步發展國民經濟、加速科技進步、轉向集約經濟之發展道路，更合理地利用國家生產潛力、全面節約各種資源及改善工作素質的基礎上，保證進一步擴大蘇維埃人民之福祉」。五年之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瑞茲柯夫（N. I. Ryzikov）在蘇共廿七大提出第十二個五年計劃經濟報告時，曾嚴厲地批評過去經濟發展的失敗與缺點<sup>③</sup>。瑞氏指出，在執行廿六大所規定的任務上，所處環境是不單純的，甚至可以說，初期階段的環境是十分複雜的。在一九七〇年代出現的經濟發展上的不良傾向，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不僅未見緩和，且有加劇之勢。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執行過程中，可以看出這種傾向。頭兩年成長速率繼續下降，經營的素質趨於惡化。瑞茲柯夫認為，這些缺點的根本原因在於：在實際活動中，未能及時考慮經濟情勢的變化，也就是說，粗放成長能力業已枯竭；在運用科技進步的成果時，未能表現應有的堅持；在國民經濟與管理的改造上，未能配合時代的需要。無論在中央，或者在地方，有許多領導人繼續按過時的方法行事，足以證明他們對新情況中的工作未作準備。

當然，瑞氏的批評有些係借用蘇聯經濟學界的看法。去年十二月公計劃經濟月刊曾刊載總結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文章，提出經濟發展出現負面效果的原因包括：(1)運用新技術和工藝設備的速度不夠；(2)許多產品，包括民生消費品的技術水平和品質不符合現代需要；(3)在供貨方面違反契約規定；(4)一些加盟共和國、部會、聯合企業對於生產工業與農業產品、運用生產力、節約物料、提高生產效率等方面未能依計劃完成；(5)未能適時考慮客觀條件的改變，不重視加速生產集約化；延宕實現結構性政策與管理方式、經營之心理態度的改造<sup>④</sup>。

註② 第一節資料摘自一九八六年元月廿六日《真理報》公布的總結報告及一九八五年元月廿六日《真理報》。

註③ 《真理報》，一九八六年三月四日；瑞茲柯夫經濟報告。

註④ *Planovoe Khozyaistvo*, 1985, N. 12, p. 4.

總之，蘇聯執行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經濟之結果，顯然是失敗了。五年之間，用於消費與積累的國民收入實際成長率祇有一七%（原訂計劃是一八·二〇%），平均每年成長率三·一%。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三·七%，農業總產值一·一%，國營與合作社商店零售總額三·一%（參見表三）<sup>⑤</sup>；以上都未能達成原訂計劃指標，特別是農業生產情況更差。根據瑞茲柯夫的報告，由於不能完成計劃，五年間短產三千五百萬噸軋鋼、一億四千五百萬噸煤炭、五千萬噸石油和一百六十億盧布的民生消費品。事實上，農業生產減短數額亦相當可觀，五年至少短產逾一億噸穀物，或價值五百億盧布的農畜產品。

從一九六六至一九七〇年，蘇聯國民收入平均每年成長率為七·八%，從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五年平均每年成長率降為五·七%，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降為三·八%，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更降為三·一%。預定一九八六至一九九〇年平均年成長率為三·五%~四%左右。國民收入成長率低落固為不爭事實，不過若衡諸世界各國同一時期的經濟成長率，則蘇聯的表現仍然不算最差。按照比較價格（即固定價格，扣除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因素），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五年每年國民收入成長率分別是三·二%、二·六%、三·一%、二·六%、三·一%。按照實際價格（即現行價格，不扣除物價上漲和通貨膨脹因素），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每年成長率分別是五·二%、七·三%和四·六%。假如根據來自生產的國民收入計算，並按實際價格，則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每年成長率分別是五·三%、七·五%、四·七%和三·九%（參見表四）。按實際價格計算成長率自是大於比較價格計算之成長率，主要是受到外貨物價和國內物價調整的影響。

「生產的國民收入」係指物質生產部門的淨產值，不包括商業、服務業等非生產性行業的勞動所得；減除外貿差額和補償損失之後即成為「用於消費與積累的國民收入」。這兩項不同性質的國民收入每年均有可觀的差額，例如一九八三年差額為一百十

註⑤ 同註③。

評析「一九八五年蘇聯國民經濟計劃執行總結」

表三：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經濟之成果

項 目	1981~1985年 總額 (億 盧 布)	1981~85年 比1976~1980 年絕對增加額 (億 盧 布)	1981~85年 比1976~1980 年實際增長率 (%)	1981~85年 比1976~1980 年計劃增長率 (%)
國 民 收 入 (用於消費與積累)	23,980	3,530	17	18~20
工 業 總 產 值	37,780	6,280	20	26~28
農 業 總 產 值 (按1983年價格)	10,100	530	6	12~14
各 類 運 輸 總 量 (億噸/公里)	371,000	57,000	18	—
啓用的固定資產	8,150	1,470	22	—
基 本 投 資	8,420	1,250	17	12~15
商 業 零 售 額	14,660	2,260	18	22~25

資料來源：《真理報》，1986年3月4日，1981年3月5日。

表四：蘇聯國民收入

(按實際價格，億盧布)

項 目	年 代									
	1970	1975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一、來自生產的國民收入	2,899	3,633	4,406	4,622	4,867	5,234	5,481	5,696	—	
二、用於消費和積累的國民收入	2,855	3,630	4,329	4,541	4,779	5,129	5,364	—	5,670	
三、外貿順差	9.6	-26.4	45.4	51.7	44.8	67.5	83	90.6	—	

資料來源：(1)*Narodnoe Khozyaistvo SSSR* v1980g, pp. 379-380, v1982g, pp. 378-379.(2)*Vestnik Statistiki*, 1986, N.2, p.75.(3)*Vneshnyaya Torgovlya SSSR* Yearbook.

七億盧布，同年外貿順差為八十三億盧布。由於蘇聯官方從未解釋外貿差額究竟是指順差或逆差、補償損失是指何種損失，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就是這一百十七億盧布的差額（包括八十三億外貿順差與三十四億補償損失）成為蘇聯對外援助和增加軍事支出的財政來源之一，折合美金約一百七十億元左右。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經濟期間，至少有五百億盧布的國民收入差額無法讓蘇聯人民享有，成為蘇共官方私藏的「小金庫」。

在過去五年之間，蘇聯經濟各部門表現最差的當屬農業，平均每年成長率祇有一·一%，達原訂計劃的半數；而且是依靠一九八二年四%，一九八三年五%的成長率方能有此成績；其餘各年度的成長率分別是：一九八一年為負二·〇%，一九八四與八五兩年均為零成長。至於農業部門當中最為脆弱、易受天候影響的是穀物栽植，一九七六至八〇年蘇聯平均每年穀物產量二億零五百萬噸，自一九八一年後不再公佈產量數目。無疑地，近五年來的穀物生產一定奇慘，並且與原訂生產計劃相距太遠<sup>⑥</sup>。穀物歉收迫使蘇聯大量進口糧食和肉品，前年美國農業部曾估計蘇聯在一九八四至八五年度將進口五千萬噸穀物，而一九八二至八三年度進口量三千二百九十萬噸，一九八一至八二年度四千六百萬噸<sup>⑦</sup>。自一九八一至八四年度，蘇聯主要糧肉食品淨進口總值達二百三十億盧布，約值美金三百廿八億元，這是一筆十分沉重的外匯負擔（參見表五）。

能源生產方面，除了天然瓦斯達到計劃產量外，電力、石油和煤炭都無法符合五年計劃經濟之指標。例如，一九八五年蘇聯電力生產有一五、四五〇億度（按原訂計劃目標為一五、五〇〇至一六、〇〇〇億度），石油五九五億噸（原訂計劃為六二〇至六四五億噸），天然瓦斯六、四三〇億立方公尺（原訂計劃為六、〇〇〇至六、四〇〇億立方公尺），煤炭七二六億噸（原訂計劃為七七〇至八〇〇億噸）。生產減少的原因絕非儲藏不足或資金缺乏，主要原因是人謀不臧，生產效率低落。

五年計劃期間，唯一超額完成計劃指標的項目是基本投資，總額高達八、四二〇億

表五：蘇聯主要糧肉食品淨進口值

(1981~84年，百萬盧布)

年 代	1981年	1982年	1983年	1984年
穀 物	4,524.6	3,933.3	3,402.9	5,116.5
牲 畜(屠體)	126.8	132.5	125.3	92.1
肉類和肉類製品	1,114.3 (909,615噸)	1,001.4 (906,389噸)	984.3 (960,699噸)	855.3 (777,917噸)
乳類和乳類製品	65.2	79.9	32.4	35.1
麵 粉	271.7 (994,848噸)	136.3 (663,763噸)	28.4 (184,453噸)	29.8 (178,880噸)
稻 米	396.0 (1,283,360噸)	249.1 (858,947噸)	87.6 (322,717噸)	65.4 (150,189噸)
蛋與蛋類製品	20.7	21.1	21.8	18.4
總 計	6,519.4	5,553.6	4,682.7	6,212.7

資料來源：根據蘇聯對外貿易各年度(1981~1984)統計年鑑編製。

盧布，比前五年增加一、二五〇億盧布，增加一七%；而原訂計劃是一二、一五%<sup>⑧</sup>。如果根據各年度經濟計劃執行總結報告，五年基本投資總額為七、八〇〇億盧布左右，比前五年約增加一、五〇〇億盧布，增幅達二三%<sup>⑨</sup>。顯然瑞效柯夫的經濟報告有意壓縮基本投資實際增加率；過多的投資與低度的經濟成長，難免會有投資浪費、分配不當和其他弊病之嫌。

從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執行結果來看，發現有一來自生產的國民收入「與「用於消費與積累的國民收入」差距加大，穀物生產情況惡劣與進口劇增、能源減產和基本投資過量等現象，顯示蘇聯經濟存在著隱蔽與難以克服的困境。

#### 肆、經濟改革與社會革新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在去年四月中央全會提到：「蘇共意識到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的最高意義就是要不斷地、逐步地提高人民福祉，改善蘇聯人民各方面的生活，建立適宜人性和諧發展的條件。為此必須在分配物質與精神財富方面不斷推行鞏固社會公義的路線，加強社會因素對經濟發展及提高其效率的影響力」<sup>⑩</sup>。「加速國家社會經濟發展」一詞，乃是過去多年來蘇聯慣用的宣傳術語，企圖以此為前提，展開所謂的經濟改造工作，進而擴及社會生活的整頓。

早在一九七九年七月，蘇共中央與蘇聯部長會議即曾通過「關於改善計劃與加強經濟結構的作用以提高生產效率和工作素質」的決議案和法規。該

註⑧ 同註③。

註⑨ 此項數字顯係比較價格，根據一九八三年《蘇聯國民經濟年鑑》三五五頁所載，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基本投資額分別是一、三八八億，一、四三八億，一、五二〇億盧布。一九七六至一九八〇年投資總額六、三四三億盧布。至於各年度計劃執行報告數字，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五年分別是一、三八〇億，一、

四一〇億，一、五〇〇億，一、七二〇億和一、七九〇億，此乃初步估計數額，會作稍許修正。

註⑩ *Kommunist*, 1985, N. 7, p. 9.

項決議案的重點有三：(1)關於提高國民經濟計劃工作水平的措施，(2)關於加速啓用生產力及提高基本建設投資效率的措施，(3)關於發展經濟核算與加強經濟槓桿和刺激的作用。而其精神係在強調完善「經濟結構」(khozyaistvennye mekhanizm, 又稱經濟機制)，這是一九八〇年代蘇聯經濟改革的起始與基本藍圖。

一九八二年五月蘇共中央頒佈「糧食綱領」，決定農業長期發展目標和農業工業化組織型態。一九八三年六月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通過「關於勞動集體及提高勞動集體在企業、機構、組織管理作用」法規(簡稱勞動集體法)，擴大勞工對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力。一九八三年七月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公佈「關於擴大工業生產聯合(企業)計劃與經營活動的權力及加強對工作結果的責任之補充措施」決議案(簡稱企業實驗法)，給與生產企業更多的經營自主權，從一九八四年開始以某些企業為試驗對象，因成效不錯乃決定擴大範圍，並且預定到一九八七年全國各生產企業全面實施企業實驗法規定的經營方式。勞動集體法與企業實驗法成爲近三年蘇聯工業經濟——特別是管理制度改革的主要依據。

就廣義而言，一九八〇年代的經濟改革祇是蘇聯經濟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階段。在「戰時共產主義」時期，係以直接的行政手段分配物資和資源爲主要管理方式。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則廣泛運用經濟核算、財政、信貸和其他價值規律以影響生產，亦即放寬經濟管制。在工業化與集體化時期，建立國民經濟計劃制度，在極短期間內集中生產資源以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科學和國防潛力。在最近三十年則實行對於完善經濟結構的有關措施。一九五〇年代對工業管理曾按區域原則設立國民經濟會議，後證實其機能欠佳，其活動無法計及部門的勞動分工和不能充分利用經濟手段影響企業工作。在一九六五—七五年間推行以企業爲核心的相互關係的改造，開始補充一些行政管理方法，並且以利潤、利潤率、經濟鼓勵基金、信貸等經濟管理手段取代舊的管理方式。建立經濟周轉的新管道——亦即生產基金的支付須反映國家對企業生產基金運用效率最低的要求水平。在一九七六—八二年之間，對中央計劃經濟範疇曾採取一連串的措施：擴大計劃範疇、建立計劃體系，包括成套的科技進步綱領及蘇聯經濟、科技長期發展綱領<sup>①</sup>。無疑地，蘇聯經濟改革不斷地在進行，且按照經濟發展與實際經驗需求作相應的改變和調整。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明顯地可以看出完善「經濟結構」應當具備綜合(成套)的性質，亦即含蓋著計劃、經濟槓桿與刺激、管理的組織結構等重要部門。

正如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伊凡柯(V. Ivanchenko)所言：「當新的情況、準繩、評價指標、刺激、組織構造改變等因素對於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結構之實際功能具有限制性、局部性之影響時，那麼應該把經濟結構改造階段視之爲從粗放發展向集約發展的過渡時期」<sup>②</sup>。亦即經濟結構改造祇是過渡階段，這種改造絕不影響社會主義所有制本質，而且使經濟發展朝向

註① Voprosy Ekonomiki, 1985, N. 9, pp. 25-26.  
註② Voprosy Ekonomiki, 1986, N. 2, p. 4.



集約生產的道路前進。結構改造主要係指管理制度與管理方式的變革，自然亦涉及企業組織型態的變化。再者，根據蘇聯經濟學者的意見，自一九六五年改革後，蘇聯經濟發展的主要教訓之一是，未能解決的經濟核算與其他管理問題，祇是屬於基本生產環節的部份（例如：發展生產隊承包制），並不涉及中央領導方式和方法<sup>④</sup>。顯然企業實驗法與勞動集體法是為解決上述問題（管理制度與方法）而訂的，其意義即為：在不改變中央計劃本質下，准許企業自主與自行管理。因此，蘇聯經濟改革並非計劃經濟制度的改變，亦非對中央領導的削權。

企業實驗法規定要實現下述目標：(1)提高聯合（企業）與企業（單位）在各個計劃階段制訂計劃的角色，並加強其保證產品生產的責任。(2)提高企業與聯合在經營活動時作為經濟指標的作用，以之作為影響五年計劃的重要槓桿（採用這些指標的用意在於鼓勵更妥當地運用一切資源；同時保證企業在穩定經營下，勞動支付與社會開發資金將按照企業最終工作成果而給與之）。(3)勞動集體的利益將從工作人員減少、物質與財政資源節約、全面加强經濟核算中取得。(4)擴大聯合和企業在提高生產技術水平時運用自有資金的權力和能力。(5)加強社會文化措施基金和住宅建設基金的作用，以解決勞動集體社會發展的任務<sup>⑤</sup>。

企業實驗法規定的具體作法包括：(1)企業經營自負盈虧，企業以自有和借貸資金支付技術改裝、企業重建和擴建、設立工資基金和經濟鼓勵基金、發展科技及其他計劃支出的費用，祇有建設新企業是由國家預算撥款支付<sup>⑥</sup>。(2)建立新指標，工資給付包括底薪和生產獎金；每完成供貨契約義務，可獲得額外的一五%的物質獎勵金，如果未完成百分之一的供貨義務，獎金減發三%（而且額外的一五%獎金亦無）。(3)生產隊向企業承包作業，與企業訂立承包契約；生產隊（即勞動集體）為一自治單位，有權參與企業管理。(4)其他細節做法，例如企業提早申報年度計劃、規定企業負責人權責和新式產品高利潤價格、外銷產品所得外匯收入保留辦法等。

因此，嚴格而言，蘇聯經濟改革非自今日始；但是現階段的改革重心係屬於聯合、企業管理制度的更易。戈巴契夫的任务不過是繼續加速經濟改革過程。

在社會革新方面，去年蘇聯社會氣象可能較往年不同。在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蘇聯總檢察長的報告指出，目前蘇聯出現大量違犯國家、勞動、計劃與契約紀律的案子，和背離社會主義經營原則的現象。以司法保障國民經濟仍未充分符合時代要求。全國大約有八萬名法律顧問，但是他們的工作有的未作適當安排，有的不能盡責。有三分之一的工業企業、半數的集體農莊

註④ *Ibid.*, 1985, N. 5, p. 87.

註⑤ *Planovoe Khozyaistvo*, 1985, N. 8, p. 11.

註⑥ *Voprosy Ekonomiki*, 1986, N. 1, p. 26.

和國營農場沒有法律服務<sup>⑥</sup>。因此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案，要求各檢察機關和其他司法單位保證進一步提高檢察執法效率，採取嚴厲措施消除任何違法情事；並要求特別注意：(1)在機關、企業、組織活動，運用科技成果，全面保護社會主義所有制；在對不經濟、浪費和竊佔國家與社會財產，進行鬥爭與保護自然環境時，應嚴格要求遵守法紀。(2)加強保護勞動、住宅和其他公民權利，以及監查公民義務的執行。(3)運用法律制裁酗酒、流氓、背離社會有益勞動的現象。(4)堅決取締投機、私營企業的活動，以及依靠非勞動所得者、寄生蟲和其他脫離社會公正原則者。(5)檢察機關應和人民代表蘇維埃、勞動集體、社會組織密切合作<sup>⑦</sup>。

運用司法工具端正社會不正風氣（包括違犯勞動紀律、經濟法規），成爲去年蘇聯當局著重的活動之一。最爲世人注目的是關於禁酒法的頒布；去年五月十七日，蘇共中央、蘇聯部長會議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分別頒布禁酒、限酒法令和有關措施，並且自六月一日開始實施<sup>⑧</sup>。蘇聯當局禁止賣酒給廿一歲以下的青年、逐年減少酒類生產量、限制售酒區域和場合、禁止在公共場合和工作地點飲酒或醉酒、規定各項罰則和刑事處分細則等。蘇聯內政部特別組織一支由五萬五千名共產黨員組成的糾察隊伍，配合警察的活動，嚴格取締抓捕違反禁酒令的醉鄉人。內政部長費多楚克（V. Fedorchuk）表示：爲配合日前公布的克服酗酒與酒精中毒有關法令，必須採取緊急措施。酒精對人類命運帶來難以估量的悲劇，使許多人被帶到被告席上。犯罪者、殺人犯者和身體嚴重損害者之中有三分之二係因酗酒而引起的。百分之七十、八十的流氓處於醉酒狀態。交通事故死亡者之中有三分之一、傷殘者之中有四分之一係因可機醉酒所致。酗酒經常導致瀆職、侵佔、竊盜行爲<sup>⑨</sup>。

蘇聯人民好酒、酗酒惡習對經濟生產工作更造成難以數計的損失，勞動時間的浪費與產品品質不良均係受醉酒勞工的直接影響。以嚴刑峻法遏止人民惡習，端正蘇聯社會種種不良風氣，無疑地業已形成一道加諸人民頭上的緊箍咒。以司法手段強化社會秩序、勞動紀律、肅清積弊雖可收一時之效，但非治本之道。

## 伍、結 論

無論就一九八五年全年、或是第十一個五年計劃實績看，蘇聯國民經濟執行結果顯然有欠理想；某些重要生產項目甚至無法達到預定目標，反而減產、少產。蘇共廿七大關於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的決議文指出：「在一九七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初，

註⑥ Pravda, July 4, 1985, p. 3.

註⑦ Pravda, July 4, 1985, pp. 1-2.

註⑧ Pravda, May 17, 1985, p. 1.

註⑨ Pravda, May 29, 1985, p. 3.

社會經濟發展出現困難與負面過程。在此一期間，經濟成長速率、勞動生產率顯著降低，一些其他的效率指標也降低了，經濟比例失調加重了。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任務，不能完全實現既定的社會措施。黨代表大會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對經濟情勢的改變不能及時給與政治評價，未能認清經濟轉向集約發展方式的迫切性和尖銳性……」<sup>②</sup>。顯然新的蘇共領導人將過去經濟失敗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却未曾想到他們也是過去那時的參與者。

況且，不論是去年或是將來，蘇聯仍舊繼續一九七九年七月規劃的經濟改革方針，並未有所更易。因此，對第十一個五年計劃的失敗實不該以「未能認清經濟轉向集約發展方式的迫切性」或其他理由推卸之。蘇聯經濟發展過程本來就具有延續性，改革是緩慢漸進的。戈巴契夫的改革實際上仍然是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契爾年柯三名已故領導人改革路線的延續。往昔的經濟敗績與有限或低成效的改革，未必不會重現於第十二個五年計劃（一九八六—九〇年）。

註② *Ekonomicheskaya Gazeta*, 1986, N. 11, p. 6.

（本文作者係本中心助理研究員）

## 國共關係簡史

本書計分六章，自早期的國共關係至最後一次的和談等，均有論列並錄原始文件多份以配合閱讀，為研究中國近代史之最佳參考書，全書約廿餘萬字，廿五開本，三四〇頁，全一冊，實售新臺幣二〇〇元（國內郵購每冊另加郵掛費十二元）。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編印

郵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二號帳戶